

2001 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柯 惕

2001 年出版的书籍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南京出版社 1 月出版的《魏特琳传》;王晓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月出版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纂,金镇烈、黄一兵翻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 月出版的《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王国林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 月出版的《天目抗日》;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4 月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鞠德源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5 月出版的《日本国窃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官丽珍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7 月出版的《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 - 1945 年日军侵粤述略》;李吉荪撰写,澳门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7 月出版的《中日南京之战》;张一波主编,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 8 月出版的《状告日本国》;李蓉、叶成林、王淇、王志刚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9 月出版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王智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9 月出版的《揭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黑幕》;苏智良著,人民出版社 9 月出版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唐正芒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12 月出版的《“笔”血丹心——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史稿》;刘兆伟编,现代出版社 12 月出版的《日本殖民教育侵略史研究》。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1 月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2001 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主要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日本研究

中心主办,1月召开的“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主办,5月召开的“纪念魏特琳逝世60周年暨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主办,8月召开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9月召开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沈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沈阳市历史学会和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9月召开的“海峡两岸‘勿忘九一八’研讨会”;中日友好协会、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10月召开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2001年中日学者研讨会”等。

仅从所见图书和论文,对一年来研究状况述评如下。

一 中国的相关研究

(一) 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一些著述开始从日本人的中国观方面进行探讨,其中龚咏梅的《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即从日本“中国学”研究入手,考察了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及其对侵华政策的影响。文章提出:“日本中国学研究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文化资源。日本侵华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多,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

重要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薄井山的《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 2001 年 1 月版)同样是从一个方面探讨日本中国学情况,但她却忽略了近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之间的关系,从这点来看,龚文提出的观点更显重要。

在日本侵华战略中,台湾处于特殊位置。以往研究已经涉及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统治,而蔡史君的《日本南侵与“台湾本岛人利用论”——台湾总督府华侨政策“具体方案”的史料发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 年第 1 期),是从日本利用台湾开展东南亚华侨工作这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在日本实行南进战略时体现出的基地作用。文章披露了一则重要的日本史料——《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作者分析指出:“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当局就将台湾定位为研究与调查东南亚资源和华侨问题的重要据点。1930 年代后期,随着战局发展的需要与日本南侵计划的具体化,以及南进步伐的加速,台湾更被明确定位为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政策所在地。与此同时,‘皇民化’教育下的‘本岛人’更被赋予特殊的任务和使命……《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无疑正是当时日本南侵战略下的产物。”该方案明确规定了“本岛人”对南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替日本“南方圈”效力的各项任务。从该文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台湾被日本作为完全殖民地而给予了较高程度的信任,这与日本对待汪伪和其他大陆伪政权的态度有很大差别。一些“本岛人”的日本情结,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经济掠夺,戴建兵的《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1 期),根据原始档案,披露了日本在战争后期利用公债发行榨

取中国财富的罪行。文章指出：“日本在中国推行公债的最主要手法就是让伪银行先行购买日本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为发行准备发行纸币。”这种没有实际投入的超经济掠夺，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表现出了极大的疯狂性。据作者统计，战时各伪银行按日本规定的比价发行了折合2807亿日元的伪钞，而其中大部分是在1945年以后发行的，如“1943年底时，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总额为162亿元，而1945年1—4月就发行了187亿元，8月一个月竟然发行了301亿余元。而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在日本失败前的发行更是天文数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中旬时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额为24917亿余元，而到9月份竟然达到了46618亿余元，一个月的发行相当于伪中储行建行以来近5年发行的46.55%”。这些损失在战后没有任何赔偿，造成了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战败前日本还利用一切手段转移对中国所欠债务，销毁证据”。

与金融掠夺相关的军票问题，因至今仍存在兑付问题而受到人们关注。曹大臣的《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票政策》（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对战时日本的军票政策的实施与结果进行了考察，作者提出：“日本在占领区实施军票政策，是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进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军最初发行军票，乃为考虑日银券币值低落的因素；军票流通之后，为排挤法币势力，日本采取各种方法维持军票的价值，1940年前后达到预期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事的不利，日政府日益感到汪伪政权在维持占领区统治方面的重要性，在得以利用中储券作为军费支付手段的情况下，遂决定于1943年4月废止军票（海南岛、香港除外）。就这样，日本在最初发行军票的时候，维护了日本人的利益；军票政策实施过程中，既打击了蒋介石政权的抗日经济基础，又笼络了汪伪势力；在有条件地废止军票时，又把战争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

身上。”

关于战争损失研究,一直受到人们关注,但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个研究一直未能深入。黄菊艳的《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损失调查述略》(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则利用地方档案资料对广东省的战争损失进行了研究。文章叙述了战时、战后广东政府和其他部门调查战争损失的过程,这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作者还根据掌握的史料,分别做出“敌机袭粤损失调查统计”、“第一次粤北战役战区各县损失统计”、“人口伤亡调查统计”和“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统计”,作者承认,这种统计仍然是不够准确和完整的,但在研究方法和寻找史料的途径方面,文章可以给研究者很好的借鉴。

(二) 中国抗日研究

1. 政治研究。

中共战时的政治倾向是重要课题,而以往关于战时中共政治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中共的抗日政策方针、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等方面。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则从另外的视角,比较宏观地分析了中共战时的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

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他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政治趋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曾经中断,但作为历史经验,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关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变化的研究,以往多以蒋介石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研究中心,荣维木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从另外的视角,提出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政局的特性是: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关于分裂问题,他认为仅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来分析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具体地分析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各种反蒋口号的提出,首先是与这种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统一问题,他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除了中共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外,日本利用和制造中国分裂以扩大侵略的阴谋的败露、美英苏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与压力、国内舆情的影响与压力等等,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

关于济南惨案的善后,过去一般是从日本侵华政策与国民党的妥协为研究视角,而韩国学者裴京汉的《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则从国民政府与民众反日运动的关系为研究视角,提出:“根据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2. 军事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军事战略转变,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毛泽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而徐波、沈卫的《张闻天与中国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则探讨了张闻天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中国红军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性转变,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抗战初期,历时两年有余,涉及诸多复杂问题。在这一巨大转变的过程中,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运筹主持,率领中共领袖集团及时提出转变任务,调整军事机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抉择合宜方略,并为日益迫切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确立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斟酌原则和理论,对此一历史性转变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章还涉及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与王明的斗争,在红军作战方式,扩军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见解,有效地抵制了王明的错误。

关于中国远征军作战研究,过去出版的著述在一些史实描述方面存在异议,其中关于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更是“聚讼不已的话题”。黄道炫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指导中,过多地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有一定责任。”他的结论是通过

大量史料的分析而得出的,因而比以往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此外,他还对远征军兵力数字及伤亡情况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证,结论是:总兵力7万出头、伤亡3万多。这比以往通常说的总兵力10万人、伤亡6万人有较大差距。

另外,与黄道炫上述研究相关的战时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及蒋、史关系问题,陈永祥的《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中的宋子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具体地分析了蒋、史在军事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认为:“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着摩擦与冲突。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便是这些摩擦与冲突的反映。”而在蒋史矛盾中,作为“英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尽管有着美国文化背景,并与蒋屡生冲突,却每在关键时刻站在了蒋的方面,在“倒史”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绥远抗战,过去由于档案披露比较零散,在一些著述中关于此役如何发生、经过情形、何人主导、结束原因等,有着不同说法。杨奎松的《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首次依据台湾大溪档案,比较准确和完整地叙述了战役始末,并提出这样的观点:“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自始至终都是在蒋介石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关于蒋介石发动绥远抗战的根本目的,作者认为“不在战,而在和”,“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平的必要,意在逼其让步与妥协”,这包含了

以攻为守的意思。但与阎锡山不同的是,蒋也做与日本破裂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有否抗日准备,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杨天石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分析,提出这样的观点:“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有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另外引人注意的是,该文还提出蒋介石“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涉及到安内与攘外的关系,这是新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

3. 外交研究

关于“广田三原则”研究,过去一般是从日本侵华政策和中日交涉过程来探讨,彭敦文的《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载《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则主要探讨该事件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他提出:“国民政府在‘三原则’交涉中的对策是在不接受但不拒绝交涉的总原则下,通过交涉途径导中日交涉于常轨,以便给中日关系留下外交折冲之余地;同时,针对‘三原则’的内容,在交涉中一面表达维持中国主权完整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与日本展开斗争,稳定对华北的控制。这种对策,从外交上来看,一方面应该说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而另一方面,它仍然是一种防御性的策略,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并且日方决不会让这种带有周旋性质的不接受但不拒绝交涉的策略无期限地延续下去,这就决定了‘三原则’交涉必然要破裂。”文章还比

较客观地指出,国民政府采取这样的外交策略,与军事准备未完成相关。

关于中苏关系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中苏复交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但由于史料的缺乏,研究未能深入。鹿锡俊的《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则利用了台湾所存原国民政府机密档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提出:“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原则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复交”与“联苏”做了区分,并提出了复交迟迟未能实现,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日本的破坏与国民政府的迂腐。

也是战时中苏关系研究,还出现了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先是孙才顺的《如何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中的是与非——论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是与非的标准,仅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不够的。抗战期间困扰中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苏两国的利益冲突,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严重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国民政府处理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针对孙才顺的观点,王真在《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

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4 期)提出:“评论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作具体历史分析,全盘否定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或过高评价国民党政府所谓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关系缺乏稳定的基础,而这又主要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是亲英美集团,改善中苏关系出于被迫。国家主权问题并没有对中苏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这不是因为主权本身不重要,而是蒋介石并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蒋介石看来,中苏关系中更为重要的无疑是苏联援助、苏联出兵,并且苏联不要支持中共。当这些条件无法满足时,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介入成为中国的盟国,中苏关系对蒋介石就失去了应有价值,关系恶化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他还特别强调:“应当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历史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历史研究的结论能够反映历史活动的本质。”可以看出,这场争论的要害主要不在于史实,而在于评判历史的角度和方法。

在战时中法关系研究中,中国借道越南运输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过去的研究很不充分。刘卫东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载《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抗战前期(1937 年 7 月—1940 年 6 月),中国根据中法签订的有关条约向法国提出了借道越南运输战略物资的请求,但法国却无视条约规定,在对华借道问题上始终不敢明确承担其义务。”之所以如此,一是法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二是奉行与英、美平行政策的产物,因而成为抗战时期西方列强对日绥靖的表现之一,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抗战能力的发挥;但是,由于法国在借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使中国过境越南的运输在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禁而不止’的政策特征又

使其带有较强的有限援华色彩,在客观效果上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4. 经济研究

关于战时经济研究,有以下几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肖际唐的《试论抗战时期孙科关于经济问题之主张》(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文章论述了孙科在战时关于“救济农村与农村经济发展”、“粮食国营与民生主义”、“东北的善后与重建”等经济主张。作者认为,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孙科主张实行合作社的方式,是受到乡村建设派的影响,但与乡村建设派不同的是,他更主张政府与农民的合作;所谓的粮食国营,是要农民直接向政府交纳粮食而不向地主交纳粮食,国家再向地方支付现金和建国储蓄券,用这种方法控制土地所有权利润;在东北善后与重建问题上,孙科提出了土地国有、推行集体农场、兴建国家工业、转东北移民等设想。作者认为孙科的以上主张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倾向。但孙的这些主张没有一样取得结果,作者没有分析原因,这也正是文章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二是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该文的价值主要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与各项经济法规的内容与制订过程。另外,作者还分析了边区经济立法的历史意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保护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经验”等等。三是闫庆生、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论述了抗战前边区农村经济的现状、边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成效、边区农村的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边区农村的阶级关系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等等,并探讨了边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前文一样,它的价

值也在于在占有较多资料的基础上,对边区农业经济发展做了比以往更为系统和详实的论述。

(三)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仍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于前几年而言,2001 年关于与受害索赔诉讼相关的史实调查研究有所减少,关于对战争善后表现出的国际政治格局的研究有所增加。另外,因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右翼教科书和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凸现了日本的右倾化问题,使得对日本战争历史认识的研究仍然受到重视。

关于国民政府战争善后研究,宋志勇的《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载《南开学报》2001 年第 4 期)值得注意。该文论述了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在废除天皇制问题上,蒋介石在战争未结束时即表明不主张废除天皇制与惩处天皇,战后追随美国反对废除天皇;在占领军派遣问题上,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即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以中国为日本占领军主导的提议,战后经多次协商,蒋开始同意以 3 个军参加对日占领,后因内战爆发而未果。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蒋采取“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方针,结果仅有少数日本战犯受到惩处。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审判过于宽大,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另外,该文还对其他国家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与中国进行了比较,以具体的数字说明了中国对日本的宽大,并且对中国审判的严谨性予以肯定。

2001 年是旧金山和约签订 50 周年,因而对该和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重新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注意。余子道的《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4 期),围绕着两个和约的签订过程,探讨了美日战后初期对中

国的政治态度。他提出：“《旧金山对日和约》屏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定，掩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在安全与政治、领土、经济等条款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它不仅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日和约，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约为基准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是美、日、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促成的一个双边和约，它在实际上构成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处于弱势力地位又急欲缔约的情势下，竭力迫使对方退让，在许多重要条款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结果。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与之签约，而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平条约，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旧金山和约与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和日本政府在《乞降照会》中的承诺。这两个和约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制造根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文章的价值在于，作者首次把“台湾地位未定”论出现的背景与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人们思考当前美日台关系提供了一条历史线索。另外，关于“日台和约”，林晓光的《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吉田茂政府处理战后对华关系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以及“日台和约”的具体内容与交涉过程，应该说也是比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战后对日媾和研究，还有张盛发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也应引起注意。该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中苏之间关于抵制旧

金山会议和约的意见交换过程,并着重分析了苏联拒签和约前后对中国因素的考虑。作者认为,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是出于如下一致认识:第一,中国要收回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苏联要确认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转交和归还苏联;第二,反对美国单独占领和管理日本,并在日本长期驻军;第三,对日本在美国扶植下东山再起怀有警惕。作者还把朝鲜战争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情况来分析苏联拒签和约的原因,提出:“对日媾和的最后阶段的工作正是在朝鲜战争微妙局势下展开的。斯大林面临的选择几乎是唯一的:拒签。”因为“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时,如果斯大林违背两国共同缔结对日和约的承诺,签署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和约,斯大林不仅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而且将有丧失朝鲜战场上中国方面战与和的主动权之虞。抗美援朝就其实质而言,是抗美援朝、援苏。”¹⁰⁰当斯大林成功地把中国推上反美第一线——朝鲜战场时,他实际上就对中国背上了道义上的债务。”这种分析,为人们考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日本右翼教科书问题研究,王智新的《揭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右翼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的背景情况。苏智良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除介绍围绕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展开的 3 次斗争外,还对日本右翼历史研究组织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卞修跃的《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4 期),则注重从国家历史认识的高度,对右翼教科书以及教科书现象反映出来的日本社会的右倾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提出:“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与战后几次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的单独

占领和不久之后其对日政策的改变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确立和固化、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不彻底、战后日本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建过程中对各种有利因素的充分利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及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近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的盛行及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这种趋势发生发展相对无力的应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研究中,王希亮的《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也应引起注意。该文提出:“从80年代初开始,日本掀起了一股否认战争责任、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赔偿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提出“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后,文章具体地分析了它产生的日本社会政治背景,评述了历史修正主义中的不同派别及其理论观点。该文对于人们了解日本社会否认战争历史思潮产生及其理论脉络是有帮助的。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荣维木的《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证研究,鞠德源的《日本国窃土源流 —

钓鱼列岛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是研究钓鱼岛问题的最新成果。该书融汇的史料远远超出了过去研究者运用的史料,其类型包容了中国历史典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始档案,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文献档案等等。依据这些文献史料,作者详实地叙述了中日间关于钓鱼列岛争端的由来和日本阴谋窃取该列岛的过程,以确凿地证据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对钓鱼列岛拥有不容置疑的主权。

二 海外的相关研究

(一) 英语国家的研究

Leo T. S. Ching 的《变成日本人:殖民地台湾和政治认同的形成》一书考察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1945 年日本投降期间,在“同化”和“国民化”等日本殖民话语霸权的高压下,台湾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在“同化”和“国民化”的文化实践中,台湾人与日本殖民主义进行斗争、谈判和合作的方式和途径。作者认为,在殖民认同的背景下,台湾社会从集体和异族斗争的层面转变到个人斗争以及人们内心排拒“变成日本人”的层面。在解剖帝国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中国和殖民的台湾的三角关系的基础上,作者展示了台湾殖民认同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Yosano Akiko 的《在满洲和蒙古的旅行:一位日本女权主义诗

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人在战前中国的见闻》是由美国著名学者 Joshua A. Fogel 翻译出版的一本游记。Yosano Akiko (1878—1942) 是日本近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出版有 20 多本诗集, 她还把日本古代的不少名著翻译成了现代日本语。她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 经常为日本最早的女权主义杂志《蓝袜子》撰稿。1928 年,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 她应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邀请, 到中国东北三省游历, 回国后写成此书。书中记述了她在东北三省的所见所闻, 既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 也有对在华的日本人和日本企业的记载, 是研究当时中日关系和东北三省社会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Yoshihisa Tak Mastusaka 的《日本满洲的形成 (1904—1932)》一书, 以时间为经, 以重大事件为纬, 全面考察了自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后近 30 年间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和殖民地经营活动, 深刻揭示了东北三省被日本逐步控制并最终沦为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作者注重研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注重分析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对其侵略满洲的政策带来的影响, 以及对满政策的成与败反过来对其国内政局造成的冲击。作者还对美国在东北对日本的挑战进行了考察, 指出在美国的压力下, 日本一度有所退缩。但是, 日本及时调整方略, 开始执行“新外交”政策和“新帝国主义”政策, 重新确立了其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作者还探究了日本与张作霖的关系和 1928—1931 年的满洲危机, 并指出, 九一八事变虽使日本攫取了中国的东北三省, 但也使其陷入了危机之中。以往, 中国学者多关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而对它给日本社会

Yosano Akiko, *Travels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A Feminist Poet from Japan Encounters Prewar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 - 193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造成的冲击较少注意,因此作者的相关论述具有参考价值。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 Sandra Wilson 的专著《满洲危机与日本社会(1931—1933)》,作者重新评估了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战前和战时日本历史上的地位,考察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派别,特别是农民团体、妇女组织和商会等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还就国际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一些问题,如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Donald A. Jordan《中国的作战尝试:1932年的上海之战》是研究1932年的淞沪抗战的一部专著。作者钩沉史料,广征博引,描述了日本人制造借口挑起战端到最后寻求达成协议以谋侵略中国其他地方的整个过程。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意辨别史料的真伪,剔除一些资料中带有宣传成份的不实部分,并纠正了中国相关著作中的一些史实错误,很值得研究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予以参考。

Stephen G. Craft 的文章《绥靖政策的反对者: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与中日关系(1932—1937)》,考察了抗战爆发前五六年间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抵制,以及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邀请原北洋政府的一些资深外交官到南京参加外交委员会,协助政府制订外交政策,其中有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

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 - 1933* (Routledge, 2001).

Donald A. Jordan,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Stephen G. Craft, "Opponents of Appeasement: Western - educated Chinese Diplomats and Intellectuals and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1932 - 37",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5, Part 1 (February 2001), pp. 195 - 216.

学)、施肇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颜惠庆(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等人。他们与罗文干(外交部长,毕业于牛津大学)、宋子文(财政部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等政府官员被称为英美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的绥靖政策。在社会上也有一批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蒋廷黻、梁实秋等人)反对对日妥协,他们主要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就外交政策问题屡屡向蒋介石政府建言。他们看重国联的作用,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反对蒋介石把有限的国力和资源用于围剿共产党和镇压其他异己力量。他们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呼吁政府早做准备。蒋介石为了推行其对日绥靖政策,不惜撤换政府中的英美派,而代之以黄郛等有日本教育背景的官员。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和因此造成的舆论对蒋介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日本的步步侵逼和全国抗日呼声的高涨,蒋介石逐渐改变对日绥靖政策,至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答应抗日,英美派的政策主张得以落到实处,其中一些人担任要职,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David P. Barrett 和 Larry N. Shyu 合编的《中国人与日本的合作(1932—1945):调和的限度》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 1995 年于温哥华召开的“中日战争”学术讨论会的 11 篇论文。全书分为 4 个部分:1.“与日本的谈判”。2.“傀儡政权”。3.“精英合作”。4.“内地”。探讨的问题包括:汪精卫与日本的合作、日据时期上海电影业的发展状况、“蚕食”的特点和“战争中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作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等。

Yoshiaki Yoshimi 的《慰安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队中

David P. Barrett, Larry N. Shyu (ed.),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 - 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的性奴隶》是一本译著,作者通过确凿的档案材料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日本军队而非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皮条客建立并管理着“慰安所”。作者特地为译著撰写了新的序言,向美国读者介绍了本书的要旨。作者在书中全面考察了不同时期日本的军事慰安所制度在亚洲各国的发展史,描述了慰安妇是如何被“征集”的,是如何生活的,并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问题。除幸存下来的慰安妇的证词外,作者还梳理了政府档案,考辨了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资料,在搞清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原因,驳斥了日本右翼关于慰安妇只是战时妓女的谬论。

Timothy Brook 在《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指出,二战后的军事法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42 年的《伦敦协议》,该协议规定将以发动“侵略战争”和“破坏和平”罪审判战败国的领导人,并以诸如谋杀等普通战争罪和新近出现的“反人类罪”审判战败国的军人。这是战争善后工作方面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东京审判拖延时间较长,且国际政治环境发生的重要变化,冷战的气氛已日渐浓厚,所以人们对东京审判的看法颇为纷纭,有人甚至把它视为“二流的表演”。作者重点研究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的审判情况,并考察了参与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对军事法庭的合法性、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的罪行、南京大屠杀的认定等一系列问题的不同

Yoshiaki Yoshimi,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Timothy Brook, "The Tokyo Judgment and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0, No. 3 (August 2001), pp. 673 - 700.

意见。作者认为,关于东京审判的争议可能永远不会停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二战的历史会有不同的解释,进而导致对东京审判的不同解释。

Timothy P. Maga 和 Tim Maga 合著的《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书,对 1946—1948 年的东京审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都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战争罪犯(包括军人和非军人)进行的正义审判。但是,纽伦堡审判很少引起后人的争议,而东京审判却经常被指责“种族主义的”和“伪善的”审判。日本天皇被免于战争责任更加深了某些人东京审判“不公正”的印象。日本右翼也攻击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本书作者认为,应该分别看待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因为东京审判没有关于种族灭绝计划的指控,由此来看,东京审判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公正的审判。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东京审判对当时的其他重要事件产生的重大影响,对麦克阿瑟的军事占领当局及其与美国国务院的关系、日本国内关于战争罪行的分歧、对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二) 日本的研究

曾田三郎编撰的《近代中国与日本——提携与敌对的半个世纪》(御茶水书房 2001 年 3 月出版),是广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成员就《近代史中的日本与中国》这一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的成果。该书共有 10 章,收录了 10 篇论文,主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中日关系的多个层面。编者认为,20 世纪前半期的日中关系是“相互依存、竞争、敌对”并存,并非单纯从“提携”走向“敌对”。事实上,该书内容包含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包含了两国的

Timothy P. Maga, Tim Maga, Judgment at Tokyo: The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敌对。其主要观点如下。

1.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曾田在第 1 章《清末政治、宪政视察团与日本》中提出,清政府为筹备宪政派载泽为首的政治视察团来日,视察团通过穗积八束与有贺长雄获得了关于日本宪政的常识。在其国家政体认识形成过程中,存在过两种可能性,即天皇亲政的政体(穗积)和以内阁为中心的政体(有贺)。水羽信男在第 3 章《一位中国共产党员与大正时期的东京》中,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施存统东京时期思想转变的过程,认为施存统思想的奋斗包含了他对中国民众民主主义运营能力与成长为变革主体的怀疑与希望。金子肇在第 5 章《1926 年的访日实业视察团与“中日亲善”》中,考察了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中日亲善”的主张与 1926 年访日时日本财界人士的对应。提出,虞从“东亚和平”以与欧美各国对抗的角度倡导中日提携,主张应废除妨碍中日提携的“二十一条”。对此,涩泽荣一等日方财界人士把中日提携限定在经济范围内,回避废除“二十一条”及返还旅大等问题。作者认为,虞洽卿访日,作为“国民外交”是有意义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其找到了实现其主张与行动的途径。筈川裕史在第 6 章《中华民国时期的土地行政与日本》中,通过对民初经济局的组织过程、政策论争、政策实施的失败等问题的分析,认为经济局受挫意味着日本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土地制度的近代化。他还提出,到国民政府时期,从政者要具体贯彻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对日本土地行政的关心大大减退。另外,富泽芳亚在第 7 章《“满洲事变”前后中国纺织技术人员对日本纺织业的认识》中,考察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纺织企业经营改革过程以及中国技术人员与日本的关系。

2. 关于中日两国的“敌对”。与上述几章关注中日“提携”的一面不同,该书最后 2 章考察了中日间“敌对”的一面。贵志俊彦在第 9 章《围绕天津租界电话问题地区与国家间的利害》中,循着

天津租界电话局问题处理的经过,探讨了中日战争时期地区问题转化为外交问题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日本的对抗。丸田孝志在第10章《华北傀儡政权的纪念日活动与民俗利用》中,以山西省为主,探讨了华北傀儡政权的纪念日庆祝活动。作者认为纪念日活动是与政权意识形态政策直接相关的宣传教育施策,也与关乎农历、时间政策、利用民俗与传统文化的社会统合政策问题密切关联。通过考察华北傀儡政权纪念日活动,作者分析了在日本统治与战争状态下,成为傀儡政权正统性根据的“传统复兴”、与汪伪政权的关系、为战时动员渗透时间概念等问题。作者指出,傀儡政权倡导“发扬东方道德文化”,一方面恢复了国民政府否定的农历祭祀、纪念日与节日,另一方面又在各地庆祝纪元节、兴亚奉公日等日本的纪念日,提倡儒教道德与佛教,视为中日共有的道德价值标准。作者认为,华北傀儡政权的纪念日活动,是日本为培养其战争顺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场所。

除曾田编撰上书外,还有几篇研究论文亦值得注意。

森久男的《察东特别行政区研究》(载《现代中国》2001年第75号),聚焦于关东军特务机关在多伦成立的察东特别行政区,考察了关东军初期的内蒙工作。认为,关东军初期的内蒙工作以经济、文化工作为重点,大蒙公司负责经济工作,善邻协会负责文化工作。大蒙公司为增强以多伦为中心的蒙古贸易,欲把经张家口联络平津地方的贸易通道转化为经多伦联络伪满的通道。但是,多伦、伪满间交通不畅,物资运输困难,1935年6月秦土协定签订后,关东军的内蒙工作便以军事、政治工作为中心迅速展开。1936年1月,张北成立察哈尔盟及盟公署,察东警备军又改编为蒙古军。关东军特务机关影响波及整个察北地区,又进而把绥东地区作为新的侵略目标。

中见立夫的《川岛浪速与北京警务学堂·高等巡警学堂》(载

《近邻》2001 年 8 月第 39 号),主要利用中国第一档案馆文献资料,考察了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参与北京警务学堂以及后来的高等巡警学堂的创设及运营的过程,揭示了川岛浪速与清末中国警察教育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的开始,与义和团运动有关。日军在北京占领区开设一种培养警官的学校,由川岛浪速负责运营。占领时期结束后,学校被清政府接收,成为警务学堂。初期,川岛对学堂的运营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清政府从“回收权利”的角度逐渐排除川岛及日本的影响。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最终在该校成功地驱逐了日本人。

权宁俊的《清末中国东北部的朝鲜民族教育与中日两国政府的干预》(《现代中国》2001 年第 75 号),从中日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清末间岛地区朝鲜人的民族教育状况以及日本的干预、中国政府的对策。作者指出,朝鲜人移住满洲地区后在间岛经营民族学校,这得到了清朝地方政府的默认。但是,日本于 1907 年 8 月设立统监府作临时派出所,设立间岛普通学校,正式开始干预朝鲜人的教育。日本还给朝鲜人私立学校以教育补助金,但条件是使用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教科书、普及日语教育、中止民族教育等,以将朝鲜人私立学校置于日本统治下。清朝政府感到日本侵入间岛后的威胁,为抵制日本的所谓“保护朝鲜人政策”,提出了重视朝鲜人教育的政策。清朝地方政府奖励朝鲜人归向中国,把朝鲜私立学校改组为官立学校,让朝鲜人子弟与中国人子弟同校受教育。但是,清朝政府并没制定朝鲜人民族教育方针,也没有设置民族教育设施。

松下佐知子的《清末民初的日本法律顾问——以有贺长雄与副岛义一的宪法构想与政治行动为中心》(载《史学杂志》第 110 编第 9 号,2001 年 9 月 20 日),从比较有贺长雄与副岛义一的宪法构想的独特视角,突破以往研究以君主制、共和制等政体为中心的框架,以哪个机关掌握国家的主导权为基础,分析二人对中国宪法构

想的变化及其构想对他们各自政治行动的影响。文章认为,在有贺的思想根基中,贯穿着一种为暂时稳定中国社会秩序的“行政”主导型的国家构想。这种以“行政”主导型国家求安定的思想,使他在“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中与元老联手行动,结果与加藤外相产生对立。因此,袁世凯政权就派有贺为密使,欲疏通袁与元老间的意图,致使加藤坚决要排斥有贺。作者认为,袁——有贺——元老之间的交涉,妨碍了外务省强调的一元化外交,影响了中日外交。关于副岛义一,作者认为,副岛对中国的法律构想是以议会为中心的“议会”主导型国家。他与有贺明显的不同在于,为了“中国的和平”,日本应以东洋主人公的身份行动。因此他批判有贺超然内阁的主张,主张议院内阁制,认为分割中国时,日本必须有单独统治中国的觉悟。

另外,有日本学者在中国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日军犯罪动因与特征的研究。如石田勇治在《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日军战时屠杀应具有种族屠杀的属性,即“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种族主义泛滥,对现实和想象中的非人化的敌人重复宣传,在心理上使士兵更容易执行屠杀敌人的政策。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处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作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作者还把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生化武器的试验与应用,都看做是种族屠杀的案例。又如笠原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性暴力的构造》(《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一文中,对出现大规模强奸事件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淞沪战役使日本速战速决战略难以继续实施,日军士兵因回家无望而产生不满和愤恨,为使士兵发泄情绪,军部认同了军队的性暴力,

并以此来激发士兵的士气。另外,日军入城式后一天就发生强奸事件千起以上,表明了日军集团性的性暴力,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三) 俄罗斯的研究

A. 科什金的《苏日中立条约》(载《亚洲》2001 年第 5 - 8 期),利用俄罗斯现存斯大林档案和日本资料,全面探讨了该条约签订的背景、过程。关于日本和苏联的签约动机,作者提出,通过哈桑和哈林郭勒事件,日本确信苏联不会进攻日本,与苏联签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苏联正式承诺停止对华援助;斯大林认为,苏联不害怕与日本发生战争,但如果日本希望和平是件好事,而签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关于签约的过程,作者认为,苏联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操作的,而日本最终达到了使苏联承诺停止援华的目的。作者认为,签约后日本并未减少边界兵力,斯大林没有真正认清“侵略者的狡诈,以及他们用诡秘的方法蒙蔽对手”。

作者的另一文章《日本走向大战之路》(载《亚非》2001 年第 11 - 12 期、2002 年第 1 期),探讨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战争对苏日关系的影响。主要观点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加大了苏日边界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正是因为对中国的援助,导致了苏日关系在 1938 年的恶化。与上文联系,可以看出作者对苏日签约的合理性的认识。

C. 鲁加宁的《1932 - 1939 哈林郭勒事件外交史》(载《近现代史》2001 年第 2 期)一文,利用俄罗斯近年公开的外交档案文献,对该事件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观点是:冲突的原因除日本希望在蒙苏边界得到有利据点,更由于日本被苏联援华激怒;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远东地区产生一定影响,促进了苏日就中立条约的对话,在此条件下,中国成为日本侵略的主要客体。

(责任编辑:李仲明)